



斯诺登与棱镜门 “老大哥” 来了!



2013年是个“有意思”的年份，特别是在信息泄露这一点上，颇有连续剧一集接一集的感觉。先是在4月份，ICIJ公布了大批量的境外信息，风波未平，接下来又是6月份的美国中央情报局（CIA）前工作人员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及其披露的“棱镜门”（Prism）项目，真可谓精彩纷呈，让人目不暇接。

境外信息泄露 VS 斯诺登 棱镜门

也许你会觉得奇怪，本期《宏杰季刊》要讨论的不是境外信息泄密吗，为何会突然笔锋一转将话题引向了斯诺登与棱镜门呢？在具体展开本文之前，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与你分享对于这两个事件关联性的认知与考量。

首先，境外信息泄露和斯诺登棱镜门事件都无可置疑地属于“信息泄露”的范畴，二者都对所涉各方影响很大，即便是普通民众也对其有所关注，特别是斯诺登及棱镜门事件，更是成为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

其次，二者都牵涉到信息的透明度和个人隐私保护的问题，如何在二者之间保持平衡，一旦平衡被（无论是由个人比如斯诺登，还是由机构比如 ICIJ，或者政府比如美国）打破，该如何界定责任边界，又该如何完善制度、技术和人，从而重回新的、改进后的平衡状态。

再者，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透明，也没有绝对的隐私。无论境外世界多么希望保持银行、投资者信息的隐私，也不管世界各国普通公众多么不乐意受美国或他们自己国家情报机构的监控，但都几乎不可能。利益的存在导致立场的不同，甲之隐私，可能就是乙之透明，反之亦然。事实上，隐私和透明不过是信息的一体两面，二者如影随行，难以独存。

说到底，控制无处不在，只是程度有差别而已。通常，控制也并不是非此即彼。昔日的大英帝国一度也像现在的美国，在搜集、控制居民信息方面是毫无争议最严密的国家——其公共广播蜚声全球便是一个明证。但是，搜集信息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对隐私的侵犯，因为很多时候国家公共政策的制定建立在信息搜集的基础之上。如果国家所搜集信息并没有影响到普通人

的正常生活，这是可以被接受的。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度”的问题，只有在信息搜集无孔不入到干扰普通人正常生活，也就是肆无忌惮、无法控制的时候，二者才有必然的联系。斯诺登所披露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行为已经进入私人领域，某种程度上，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1984》里所描绘的图景似乎正在上演……

斯诺登及其让人眼花缭乱 的棱镜门

一个叛变的CIA特工，秘密逃往海外，威胁爆出所有国家机密，政府对其展开拘捕，发誓让其消声……这不是又一部俗套的好莱坞电影，这是曾经发生的真实故事。

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30岁，前CIA雇员，有一个幸福的家庭，还有一个年薪达20万美元的稳定职业；现在，他将永远失去上述身份——他成了一个“深喉”（Deep Throat），一个无法定性的人——英雄VS叛徒。

在做出上述举动之前，斯诺登是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承包商博思艾伦的员工；如果按照中国的标准，斯诺登就是典型的“临时工”了。当然，在其他国家，没有“临时工”这样的称呼，大体上算是“外判工”。

2013年6月，斯诺登将美国国家安全局关于棱镜门监听项目的秘密文档披露给了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随即遭美国政府通缉。

事发时，斯诺登人在香港，并在香港停留22天。

2013年6月21日，斯诺登通过《卫

Special | 特别分享

斯诺登与棱镜门：“老大哥”来了！

报》再次曝光英国“颞颥”⁸(Temple)秘密情报监视项目。

2013年7月1日，维基解密网站日前披露，斯诺登在向厄瓜多尔和冰岛申请庇护后，又向19个国家寻求庇护。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和玻利维亚3国已经表示愿意为他提供庇护。

2013年7月16日，斯诺登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2013年8月1日，北京时间7:30斯诺登离开俄罗斯谢列梅捷沃机场前往莫斯科境内，并获得俄罗斯为期1年的临时避难申请。

在斯诺登事件之后，奥巴马继续为监控辩护，“……你不可能保持百分之百隐私……获得百分之百的安全……我们将不得不做出一些选择……”由此可见，隐私与自由已经变得多么稀有和宝贵了，即使是在美国！

注释：

8 读音为“niè rú”，相对应的英文为“Temple”，意思是人和某些其他哺乳动物头两侧的区域，在眼和前额之后，颤弓之上，耳之前，常引申为听、聆听之意。中国境外中文媒体，亦将“Temple”译为“圣殿”。



方块知识 5：水门事件中的“深喉”

深喉(Deep Throat)，即在水门事件中为记者提供重要资料的人。1972年，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依据线人“深喉”的消息，撬开“水门事件”的内幕，导致时任的美国总统尼克松辞职下台。事后，这两名记者一直拒绝透露当时线人的身份。

正是得益于内线“深喉”的信息，“水门事件”内幕才大白于天下。因此，为了公众利益而奋不顾身地作证的人，新闻调查通常称他们为“深喉”。

与“深喉”联系、报道出“水门事件”的记者伍德沃德和伯恩斯坦当时都很年轻，但他们因此一举闻名世界，并获得了1973年的普利策奖。他们的经历给无数年轻记者以信心和激励，鼓舞记者们勇敢、执着地追踪事实真相。“深喉”事件改变了美国的新闻报道，使那些秘密的消息从此开始更多地登上“大雅之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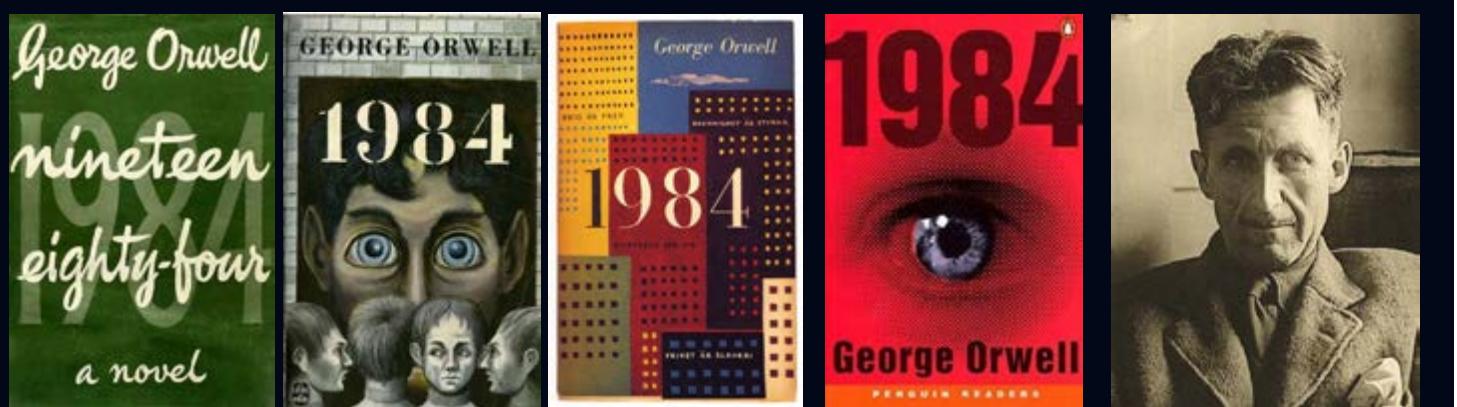
在美国200多年的历史上，“水门事件”成为最大的政治丑闻之一。作为在竞选时发生的最为严重的政治腐败行为，这起事件的教训对美国的政治体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这导致民众对总统的看法和印象开始发生某些改变，总统权力也受到更多限制和约束。尽管此后美国两党政治竞选愈演愈烈，双方也是奇招迭出，但是40多年来美国历任政客都以史为鉴，不敢突破这道政治“红线”。

时光荏苒，2005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前副局长马克·费尔特承认自己就是“水门事件”中那个曾被称为“深喉”的人，他曾向美国《华盛顿邮报》记者提供尼克松总统“水门事件”的关键线索。我们从“深喉”事件中可以充分看出美国媒体对线人的保护。40多年来，人们始终不知道“深喉”的真实身份，最大程度保护了线人。

相比之下，斯诺登比费尔特的表现要激烈、直接得多，可能这与斯诺登年轻气盛有关。但也许像斯诺登一样强调的那样，他更多是出自对公众利益的责任，多少带有理想主义的色彩。此外，斯诺登之所以敢公开自己的身份，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国际社会对斯诺登这样曝光美国信息控制的“英雄”持有更大程度的接纳和支持。此前维基解密事件中的阿桑奇，便是一例。



(年轻时的费尔特)



英国作家 George Orwell 及其小说《1984》各版本封面



方块知识 6：卷入斯诺登和棱镜门的商业机构

“棱镜”，在光学中是一种透明的光学元件，抛光与平坦的表面能折射光线。对于利用各种商业公司的渠道来窃取本国和外国个人、机构信息的情报搜集项目来说，这是一个再贴切不过的代号。

根据斯诺登向英国《卫报》和美国《华盛顿邮报》披露的信息，多家知名国际 IT 公司先后加入了棱镜项目，分别是微软（2007 年）、雅虎（2008 年）、谷歌（2009 年）、脸谱（2009 年）、Paltalk（2009 年）、YouTube（2010 年）、Skype（2011 年）、美国在线（2011 年）以及苹果公司（2012 年）。此外，Dropbox 也被指控“即将加入”。根据被披露的“棱镜”项目细节，美国情报部门从上述互联网服务提供商的服务器直接进行信息收集。

除了棱镜项目以外，斯诺登还披露了另外一个“上行”（Streaming）项目，其在承载互联网骨干通信内容的光缆上安装分光镜，复制其通信内容，涉及的公司包括著名的维赛和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

一石激起千层浪，斯诺登爆出的这些信息引发了外界的高度关注和对相关公司的指责。各大公司随后纷纷发表声明，否认参与到“棱镜”项目中。但后来，被斯诺登曝光的美国互联网巨头转变了态度。比如，2013 年 6 月 14 日，脸谱称：“我们在继续追求更高的透明度，这样全世界各地的用户才会明白，政府是多么频繁地以国家安全名义要求我们提供用户数据。”

业内人士认为，即使不使用脸谱、谷歌等服务器在美国的互联网服务，也很难保证信息不被美方情报部门获取。如果不使用美国公司的服务，通讯范围只局限于国内，通讯是不会被监控的。但是如果中国的骨干网络被入侵了，加上了“后门”，这些通讯依然可能被美国监听。

George Orwell 预言的“1984”已到来？

“温斯顿的住所在七层楼上，他三十九岁。右脚脖子上患静脉曲张，因此爬得很慢，一路上休息了好几次。每上一层楼，正对着电梯门的墙上就有那幅画着很大脸庞的招贴画凝视着。这是属于这样的一类画，你不论走到哪里，画中的眼光总是跟着你。下面的文字说明是：老大哥在看着你……”

这是乔治·奥威尔在其传世之作《1984》中的一个片段，文中主人公温斯顿·史密斯（Winston Smith）的上述感受和媒体报道中斯诺登藏匿在香港美丽华酒店内的情形如出一辙，何其相似。报道说，斯诺登害怕外面所有的一切，用毛巾塞上所有的门窗缝隙，他把手机放进冰箱里防止被窃，每次都给笔记本电脑带上罩子才敢输入密码，外面的火警警报声更是让他胆战心惊，不敢出去看个究竟，唯恐是对他的诱捕……

如此种种，逃亡中的斯诺登似乎生

活在一张巨大的天幕下，美国正如奥威尔笔下的老大哥一样，看不到、摸不着但又无处不在、无所不在。是的，美国这个“老大哥”在看着斯诺登，他的一举一动都被纳入监控之中，随时面临着被抓捕的危险，怎能不让这个说不清是叛徒还是英雄的斯诺登如惊弓之鸟，惶惶不可终日。

作为中央情报局的前工作人员，斯诺登深谙美国情报部门的作风与手段，其尚且如此难逃天罗地网，更何况普通人呢？据斯诺登称，之所以逃离美国并泄露棱镜门信息，主要是“我愿意做出牺牲，因为我的良心不允许美国政府用庞大的监控机器侵犯民众隐私，摧毁互联网自由”。

斯诺登指责美国侵犯民众隐私、摧毁互联网自由的理由在于棱镜这一秘密项目：

(1) 直接接入苹果、谷歌、脸谱等互联网公司的服务器，收集用户的各种个人信息，包括电子邮件、聊天记录、信用卡信息等；

(2) 美国政府每日每夜都在收集美国最大的电信运营商威讯(Verizon)的用户信息，无论其用户是美国公民还是非美国公民，无论其有无犯罪记录，无论其通话是国内还是国际；

(3) 美国政府数年来一直在对中国大陆和香港的电脑网络进行攻击，包括个人和香港中文大学这样的机构。

(4) 2009年伦敦举行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伦敦当局利用特设网吧，在电脑上安装软件程序截取电邮及监控数据，又入侵保安系统，监视与会各国领袖及官员通信和电邮文件。

.....

倘若真的如此，连各国领袖的信息都在政府（美国、英国及其他国家）监控之下，更何况普通民众呢？只是大多数时候，我们普通人并不知情，或者即便知道时刻受到监控，但因为没有影响到日常生活而选择性地无视“老大哥”的存在罢了。

在这一点上，斯诺登比大多数人表现得更为激烈，也许是因为熟悉美国情报系统内部情况的原因，他成了那个说出皇帝没有穿衣服的孩子，并且单纯、恳切地认为自己既不是叛徒也不是英

雄——因为他细心地挑选了外泄的文件，确保都是关系公共利益的材料。虽然许多材料能造成更大的影响，但他没有泄漏。伤害人不是目的，揭露真相才是。

注释：

⁹ 大洋国是乔治·奥威尔在《1984》一书中虚拟的一个国家，带有乌托邦的意味。

相比较而言，生活在现实中的斯诺登似乎比生活在虚拟“大洋国”⁹中的温斯顿更加勇敢，他们一个逃离了现行体制，一个却最终选择了被体制同化，成为一个闲散的醉鬼。事实上，《1984》这本书最初的名字为“欧洲最后的一个人”(The Last Man in Europe)，似乎表达了他内心那种反乌托邦的深刻悲哀与无奈。《1984》中，温斯顿这“欧洲最后的一个人”停止了独立思考，屈服了。

而在现实中，几十年过去的2013年，美国“老大哥”对其他国家的监控比书中的“大洋国”有过之而无不及。值得庆幸的是，温斯顿也许是欧洲最后一个人，却不是世界最后的一个人，因为有斯诺登——他走了和温斯顿相反的路，逃离了，反抗了，披露了，尽管他的逃亡之路仍未可知！

2013年7月，斯诺登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和平奖提名……

“大数据”时代的透明与隐私



信息之于民主，就如同货币之于经济。

——托马斯·杰弗逊(1743–1826)，第三任美国总统

信息的透明与隐私，从一开始就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永远都处于一种无法完全调和的状态。一方面，公众希望政府信息能够透明，方便对政府进行监督；另一方面，公众又希望自己的私人领域不受侵犯，隐私能够得到有效的保障。同样地，对于政府机构来说，其并不想完全公开所有行政信息，因为权力总需要一些灰色地带来寻找私人利益。但是，政府却希望能够掌控公众、甚至其他国家和地区尽可能多的信息，以便于更大限度地维护既有秩序和既得利益。

美国半个多世纪信息开放、技术创新的历史，就是一部政府信息隐私与透明的互相斗争史。对

此，徐子沛在《大数据：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以及它如何改变政府、商业与我们的生活》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可参见第一章《历史争战 <信息自由法>》。

如果跳脱出政府和公众的范畴，不同国家之间，特别是强势国家对弱小国家之间，前者亦非常希望能够掌控后者尽可能多的信息和数据，以便于维护自身利益。比如，在岸国家对境外世界银行保密法的一再指责。如此这样，就构成了一种无解的两难困境——如何在透明与隐私这条钢丝绳上保持一种相对的平衡，变得非常重要。

特别是在大数据（Big Data）时代。一方面，人们通过网络，或者藉由移动手机、平板电脑、社交网络、各种Pos机、会员卡等等

渠道不断地创造出来巨量的信息，另一方面，通过对这些大数据的搜集、整理、分析、挖掘，再将数据转化为信息用到各种不同的用途，比如商业消费、竞选宣传、公共服务，甚至一些不为人知的目的。

也就是说，置身于现在的大数据时代，人们的信息全部数据化，而这些都为商业公司/政府机构所掌握。对于他们来讲，我们就是透明的存在了，这个时候，我们每个人真正成为了数据元件，以一定的逻辑法则串联，而他们就成为了CPU，控制我们的一切。我们毫无隐私可言，想想都觉得可怕，似乎有一阵冷风嗖嗖地往脖子里钻。

一个没有隐私的世界，何况境外？

即便让人觉得冰冷可怕，但却是这个世界的一种真实存在。世界上没有绝对的透明，也没有绝对的隐私，有时候甚至当事人就是隐私和透明本身的制造者和泄密者。从这个角度上看，这是一个没有绝对隐私的世界，斯诺登爆料出来的世界各国元首如此，香港中文大学如此，世界各国的网民也如此。更何况境外世界呢？

2009年，自从OECD推出“白名单”后，税收信息交换网络的搭建成为境外世界最为紧迫的任务。随后OECD又专门成立了全球论坛（Global Forum）对境外金融中心所签署的TIEA数量和法律架构进行评估，几乎所有境外金融中心的税务信息都可以应在岸国家的要求而得到交换。也就是说，即便是做了一些信托的代名安排，只要涉及到跨境避税，只要在岸国家愿意，都可以通过正式的渠道获得它们想要的信息，比如最终受益人是谁，在哪个环节进行了避税安排，资金来源是否合法等等。

对于这一点，我们似乎可以从2013年8月中国山东省济南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薄熙来所披露出来的信息中得到例证。根据庭审披露，薄熙来的妻子薄谷开来为了保护300



方块知识7：澳新两国被指与美国合作监听

信息来源：财新网

继英国与美国国家安全局的情报监听合作被斯诺登曝光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被卷入其中。澳大利亚《世纪报》等媒体报道称，一份美国国家安全局绝密地图被刊登在7月8日的巴西《环球报》（O Globo）上，地图上标示了美国及其盟友数十处截取全球电信和网络信号的情报收集点。

其中，为代号“X-Keyscore”情报计划服务的四处机构位于澳大利亚，分别是：设在松峡（Pine Gap）的美澳共同防务基地，以及三个隶属于澳大利亚信号局的机构——位于达尔文附近的肖尔湾接收站、位于杰拉尔顿（Geraldton）的澳大利亚防务卫星通信站以及位于堪培拉郊外的澳大利亚皇家海军哈曼通信站。隶属于新西兰政府通信安全局的一处位于怀霍派（Waihopai）的设施同样为这一计划提供了帮助。

这份地图由斯诺登向英国《卫报》专栏作家、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提供。7月6日，两人进行了长时间的通话，也是自斯诺登离开香港后两人之间的首次对话。斯诺登称，美国与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组成了所谓“五眼（Five Eyes）”情报联盟，“有时，另外四国的情报搜集工作比美国国安局做得更过分。”澳大利亚政府发言人发言人对“X-Keyscore”计划拒绝评价。

多万美元的法国房产安排了复杂的信托和公司架构，但是司法机关还是获取了完整的证据来证明控股结果完全是薄谷开来和薄熙来的个人代持。事实上，也正是其中一个代持人尼尔·伍德“狮子大开口”勒索代持股份的服务费用，才导致薄谷开来护子心切投毒杀人，并成为触发薄熙来下台的导火索。

2010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海外账户纳税法案，其条款要求所有的美国税务居民和外国金融机构（Foreign Financial Institution，下称“FFI”）必须向美国国税局报告其美国客户的账户信息；不合作的金融机构若有源自美国的任何收入，包括获得投资处置收入和来源于美国资产的利息、股息收入，将会被扣缴30%的预提所得税。

近日，美国宣布将海外账户纳税法案的生效时间推迟半年，由原定的2014年1月1日，延迟6个月至2014年7月1日。而原定于2013年10月25日的第一批FFI注册截止日期也相应延迟6个月。目前美国已与挪威、西班牙、墨西哥、英国、爱尔兰、丹麦、瑞士、新加坡等9个国家签署了政府间协议，同时也在与全球超过80个国家和地区进行相关对话。

以瑞士为例，其银行保密法已有近80年的历史，正是这一严格保护全球各国客户隐私的法律使得瑞士银行蜚声国际，受到全球客户的信赖。瑞士虽然不想接受FATCA协定，但根本就不现实。因为，美国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除非瑞士的金融机构不想继续在美国运作、被排除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否则就得做出妥协。如此一来，瑞士的银行保密法对美国来说已经名存实亡，但又能如何？

美国税收“监管风暴”暂时延缓“登陆”，主要是因为一些合作国家（包

括中国）的金融机构还远未做好准备。即使延迟半年，这一天终将到来。那些通过境外工具来投资、资产规划的美国人或美国绿卡持有者超过5万美元的海外账户信息，都会被世界各国的金融机构提交给美国税务局，隐私将无处遁形。

境外世界受到的上述政策层面的压力已经开始传导到实际操作层面，直接影响到一些投资者的营商活动了。对于中间的金融机构来说，以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为例，它们主要从事境外公司国际银行服务，由于受到美国反洗钱方面的控告，分别支付了高达19.2亿美元和6.7亿美元的罚款进行和解。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汇丰、渣打这样的金融机构不得不将压力转移给终端的投资者，加大了对银行开户的审核力度。

不仅如此，2013年俄国杜马提议的修正案中已明确禁止境外公司参与政府采购和获取补贴。从OECD“黑名单”到美国FATCA对以境外公司投资美国的人征收重税（比如30%的预提所得税），再到现在境外公司经营受限以及银行开户从严，可以看到，某种程度上“狼”真的来了……

| 宏杰立场

作为负责任的企业公民，宏杰对政府机构搜集信息并不会表示盲目的强烈反对。我们知道，每当使用政府的公共服务时，大量的个人信息就会被提交给政府机构。比如，使用政府支持的公立学校、公立医院所提供的服务时。作为负责任的现代公民，我们应当向政府披露一些私人信息，从而享受政府机构提供的公共服务以维持我们的安全感。这对政府、社会及我们个人的良好发展都至关重要。

也就是说，我们完全赞同政府在合理、适度范围内进行信息搜集，因为这并不等同于对隐私的侵入。相反，我们只会对那些被政府滥用的信息感到不舒服。某种意义上，斯诺登仅仅公开了美国政府搜集本国及其他国家居民的方法，并没有公布所涉及到的居民信息细节。

斯诺登事件之所以会在美国成为一个“事件”，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美国居民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享受匿名待遇——他们认为私密性和隐私是一回事。在一个国家（包括香港、澳门这样的司法管辖区），持有身份证件是享受该国各种服务的“必备条件”。你知道吗？一个美国公民，他/她并不需要持有身份证件、驾照、护照以及社保账号。某些情况下，如果你生活在美国，你不能简单地建立起通常意义上的居民身份，因为并无对你个人居民身份的登记、记录。因此，对美国人来说，他们很难理解为什么私密性和隐私不是一回事。

从一个境外从业人员的角度看，



我们一再强调，我们强烈反对将境外架构用作非法目的；与此同时，我们并不反对政府通过合法渠道获取与其本国居民相关的信息。我们所质疑的是，政府机构获取私人信息的方式、方法是否合法、合乎道德规范。此外，客户是否允许或希望中介机构公开其信息，这一点也非常重要。如果客户持反对意见，除在政府机构合法、合理提出要求外，我们将秉持“客户至上”的原则，尽最大努力确保客户的私密性，不做任何公开和披露。